

高端

河北:培育新市场主体助推绿色崛起

■ 本报记者 王军 张博

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省长张庆伟表示,河北省大气污染综合整治,三年好转、五年改善的总体目标不变,政府会在大气整治的过程中同时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实现有进有退,退的是工业不达标、排放不达标产业和工厂,进的是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政府会在转化劳动力方面进行指导,为了保证关停企业职工的权益,这些转移安置人员的“五险一金”会有社保接续,政府会继续缴纳这些职工的社保。同时创造机会,培育新的市场主体,在

发展当中,在进退有序当中,实现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常务副省长杨崇勇表示,建议建立中央层面的协调机制,加快协同顶层设计,国务院应尽早研究出台,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指导意见,抓紧编制首都经济圈一体化发展规划。

京津冀协调发展需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改变三地各自为政的情况,建议把三地打造成全面改革和扩大开放的示范区和实验区,通过把北京一些不符合首都定位的功能转移到河北和天津,这样一方

面可以缓解北京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压力,另一方面也可以实现三地优势互补和互惠互利。而要实现这一目的,首先要实现的是京津冀三地的交通一体化,把交通一体化作为协同发展的重要领域和首要领域,统筹规划,建设现代、智能化的交通网络体系。建议国家着力推进三地的重要基础设施建设和交通格局一体化,加快形成三地高效、快捷、安全、大容量的互通互联的、综合交通网络。同时建议国家设立环渤海自由贸易区或京津冀自由贸易区,比照上海自由贸易区,出台相关政策,推动京津冀城市群的发展。

山西:以综改打破利益固化格局

■ 本报记者 王启明

日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创新是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原动力。产业结构调整要依靠改革,进退并举。”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发改委主任王赋的心中也有一个蓝图,综改是山西最大的改革工程。改革本身是中国的主旋律,目前的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山西的改革也是如此,已经触及到了一些固化的利益,必须通过改革予以破除。

王赋指出,2013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经济环境,山西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历史上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2014年,在年初确定9600亿元重大项目投资盘子基础上,针对重大基础设施投资减少和

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实际情况,及时新增铁路、保障性住房等领域投资计划300亿元,有效保障了全省投资快速增长。

就深化产业结构调整,王赋称,报告中重点提出的“鼓励企业设立研发机构,牵头构建产学研协同创新联盟。全面落实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普惠性措施。把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股权激励、科技成果处置权收益权改革等试点政策”,这对于企业本身来说,是一个大喜之事。

山西在成为综改试验区区域之后,在各个领域都推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就是下定决心,既要攻观念陈旧之坚,又要攻无所作为之坚,还要攻利益固化之坚,更要攻体制机制障碍之坚。

王赋强调,今年山西部署了以“3675”

为核心的重点任务。包括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进资源配置市场化改革、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等30项重大改革;推进综合能源基地建设、加快推进粉煤灰资源综合利用、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等60项重大事项;山西科技创新新城等70个重大项目,资源和生态环境产权制度研究等5个重大课题,11个市,重点开展农业生产经营机制、就业促进机制、园区管理体制、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多元投入机制等4项改革创新,27个省级试点县,重点开展创新民营经济促进机制、人才培养引进机制、城乡一体化发展机制、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等4项改革;同时,全省各县(市、区)借鉴省级试点县的成功经验,推进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和金融创新。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老百姓医药连锁有限公司董事长谢子龙:

让政府和市场各归其位

■ 本报记者 张龙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老百姓医药连锁有限公司董事长谢子龙向《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建议国家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充分引入市场机制。

“政府应抓住新一轮行政体制改革机遇,按照‘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社会的归社会’的基本思路,创新行政审批方式和政府绩效管理,加大行政服务实体平台和虚拟平台建设力度,积极推进并联审批和电子审批,进一步减少行政审批事项,降低行政审批成本,最大限度地方便生产企业,服务地方经济,促进产业快速发展。同时,探索实践行政审批服务质量管理认证,促进行政审批管理高效化、运行规范化、服务标准化。”谢子龙说。

在中央层面,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优化政府机构设置、职能配置、工作流程,完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行政运行机制。严格绩效管理,突出责任落实,确保权责一致”。

在谢子龙看来,一些职能部门在行政中还存在诸多越法行政、职责不清晰、效率低下等问题。“主要表现在部分政府机关公务员的法律意识还停留在依法行政就是把下级、基层驯服贴,并没有认识到依法行政首先应该依法把自己治理好;政府职能部门的揽权



王利博制图

行为泛滥,见利就揽;职能部门或官员见责就推,不敢担责任;政府与市场职责不清晰,政府管了本该市场来决定的事情,另外政府该管的事情又没管。”谢子龙认为。

常年与政府打交道的谢子龙认为,政务要公开,政府要透明,减少自由裁量权。政府服务应切实做到“集中、透明、便民、高效”,把政府权力放在阳光下公开运行,从而实现政府与民心、民意、民情的联动,保障人民政府为人民服务。如建立“政务公众平台”,及时发布政务信息;建立“行政效能微信投诉

平台”,接受社会各界对政府部门及干部办事效率、工作作风等方面的投诉举报等,切实防止故意拖延、违规审批等现象发生,破除行业垄断和由此滋生的腐败行为。

此外,谢子龙表示,法律的修订也要立足国情、与时俱进,真正做到公众利益至上,杜绝个别政府部门为本部门谋利而制定或修订相关“土法”,置法律于不顾,以权压法,以言代法。同时,法律修订应及时结合社会发展趋势,保持法律与时俱进的时代先进性,做到纸上公平和现实公平。

全国政协委员、香江集团总裁翟美卿:

加强财政预算管理

■ 本报记者 刘凌林

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包括公共财政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在内的财政预算体系,但随着客观情况的不断变化,现行的预算管理还存在一些不够规范、不够完善的地方,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财政预算管理和监督的有效性。主要存在预算管理体系不够健全、预算编制不够科学、预算执行不够规范、预算

监督不够有效等方面的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香江集团总裁翟美卿建议,完善预算管理体系,加快预算法修订,重点从预算管理的统一完整性、预算执行的严格规范性以及预算监督的严肃有效性三方面着手。应细化预算编制管理,建立全面、标准统一的预算编制口径,将所有政府收支均纳入预算管理范围。规范预算调整,强化预算执行及跟踪分析,特别要调整优化转移支付、整合力度和监督。

同时,落实行政问责制度,强化纠错机制,严格责任追究。确保公众及新闻媒体、人大及纪检监察部门在一定范围内拥有独立的财政预算监督权。进一步加强预算信息系统工程建设,建立政府预算公告制度。畅通公众参与预算管理的渠道,通过听证会或座谈会的形式,对相关预算信息进行沟通,切实保障公民参与权的实现。加强舆论媒体的监督作用,提高政府预算透明度。

财税改革



全国人大代表、TCL 集团董事长李东生:

个税起征点应提到 8000 元

■ 本报记者 张龙

全国人大代表、TCL 集团董事长李东生玩微博有点“上瘾”,每年两会前,李东生都会通过微博向网友征集两会建议。

李东生告诉记者:“通过微博,得到的反映比较集中,在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方面,怎么能够让收入更加公平?我再次建议,把个税起征点提到8000元,这个标准我认为合适的。”

今年以来,李东生继续通过微博公开征集两会建议,共收集到网友的13000多条意见建议,结合自身在企业经营、公益教育、产业推动等方面的实际体会,重点关注了产业创新、农村教育、环保治理和收入分配等民生问题。

2011年两会时,李东生曾向网友征集有关减税方面的建议,那时他在微博上的粉丝数量为70万人,今年,他的微博粉丝数量已高达600万人。

李东生今年向两会提交了《关于进一步提高最低收入水平,落实收入分配改革机制的建议》议案。针对我国社会收入分配的巨大差异现状,提出进一步提高最低收入水平、落实收入分配改革机制的建议。

议案指出,我国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原因除了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自然的两极分化之外,体制不健全导致的分配不公;垄断行业与竞争性行业差距越来越大;劳动报酬在居民收入中比重逐年下降这几点也是主要构成体现。

这几年来,李东生关于“提高个税起征点”呼声一直不断。

去年,李东生提交的名为《实现幸福中国梦,进一步改革收入分配机制》的议案称,当前中国,社会收入分配存在很多问题。他建议,一是完善个人所得税征收,加大个税申报监管力度,加大偷漏税惩罚强度;二是将个人所得税的征管重点转向高收入阶层;三是完善消费税征收,针对高收入阶层遏制“大征税范围,增加应税税目;四是完善财产税制,针对土地、房屋等不动产等征收“升值税”,尽快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抑制个人财富的积聚。

“个税起征点提高到3500元还是低了一点,有点失望。”李东生去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

2011年,李东生曾表示:“综合了各位博友提出的意见和对个税实际情况的调研,我建议将个税起征点提高到5000元。这样中低收入者受益较大,而对整体财政收入的影响则相对有限。”李东生显然对于个税问题经过了一番详尽的调查。他抛出的一系列数字显示,1994年新税制改革之后,个人所得税收入强劲增长,从1994年的73亿元增长到2010年的4837亿元,年复合平均增幅达到28%,是增长最为强劲的税种之一。

那一年,李东生认为,经过测算,将个税起征点提高到5000元对国家总财政收入影响不超过2%。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银行监事、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原总裁梅兴保:

央行应该担当起互联网金融责任

■ 本报记者 陈玮英

互联网金融在2013年可谓是风生水起,这也成为今年全国两会的热词。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银行监事、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原总裁梅兴保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互联网金融是新的业态,在丰富了人们选择的同时,还需要引起高层警醒,提前谋划。

2013年,被称为互联网金融的元年,给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传统金融行业带来不小冲击。

梅兴保表示,互联网金融不仅丰富了金融的服务而且非常便捷,发展趋势比较好。不过,目前,互联网金融没有国际经验可供借鉴,大家都是在同一起跑线上,因此,“政府应该警醒,提前谋划、规划,分清责任”。

“互联网金融很大一个问题是跨行业,证券、保险、银行等跨度大,因此,监管的难度也比较大。”梅兴保建议,设计技术平台的支撑,依靠着目前的通信业和信息技术产业,因此,“央行应该担当起责任,设计一些制度。当然,创新还在继续,我们要留有观察期。”

在互联网金融中,余额宝成为突发现象。“数额大,牵涉的客户多,”梅兴保认为,“既然是做金融,还是应该尊重金融业的发展规律,有存款的功能就需要有存款准备金,应该守住底线不能非法集资,在法律的框架之内开展。”

此前,证监会发言人曾表示,为了更好地促进余额宝等互联网金融的健康稳定发展,证监会正在研究进一步加强货币市场基金风险管理和互联网销售基金监管的有关规则。这标志着前一段时间炒得沸沸扬扬的余额宝,已经进入金融监管者的视线,相关监管政策将会浮出水面。

民营银行的成立也是近来各界比较关心的话题。梅兴保认为,“今年发起成立民营银行,会有几家出现,但不会太多,需要过程来试一试到底效果会是什么样。”

事实上,民营银行一直存在,区别在于,“现在是由民营资本依法发起设立,原来的民营银行还只是国有金融机构当大股东等发起,现在由民营资本就可以发起,但是有一些条件,不过条件比之前要宽松。”梅兴保“比较看好”。

而又将如何防范潜在风险呢?梅兴保表示,“当前大规模推出还需有银行资本制度、破产法等制度出台。现在把前面的条件设置得比较科学合理,使股东能够承诺,能够有救助的机制,比如谁发起设立民营银行,那么今后出现经营性的困难,可以由资本金进行补充,类似出现破产关门等,那么发起设立民营银行的股东,应该有担保性的承诺,而在发起设立的章程中就应该有所承诺。”

职能部门或官员见责就推,不敢担责任。识到依法行政首先应该依法把自己治理好;政府职能部门的揽权行为泛滥,见利就揽;部分政府机关公务员的法律意识还停留在依法行政就是把下级、基层驯服贴,并没有认识到依法行政首先应该依法把自己治理好;政府职能部门的揽权